

关注

献礼影片的集群化出发

□张东

用电影为国家庆生是中国电影工作者一直以来的传统,从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国产新片展映开始,新中国每一次重大国庆盛典,电影界都会推出一批献礼片。今年的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是一个特别值得国人自豪的日子,电影人也纷纷拿出优秀作品为新中国70年献礼。

9月30日,三部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以集群化的方式,强势登陆国庆档,8天时间创下50万票房,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走进电影院。这个国庆节,看阅兵,看电影,成为许多国民新的度假方式。街头巷尾人们在谈论电影,微博微信上,关于献礼片的话题也久久占居热搜榜。如果把此前上映的《烈火英雄》《古田军号》《决胜时刻》等影片放在一起考量,我们发现中国的新主流电影创造了一个史上最强国庆档。特别可贵的是,这批影片做到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个中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我以为创作者尊重艺术规律,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影片成功的重要原因,具体说来就是主流价值观导向、类型化的叙事、精良的制作以及工业化体系下专业发行营销的通力合作。

无论是我们之前所称的“主旋律”,还是现在大家谈及的“新主流电影”,献礼片都是为某一个特定目标制作的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定制产品。这种定制对它的政治导向、思想意义给予了不可逆转的界定。上述几部影片的价值观、政治导向,与国家主流价值相一致,歌颂国家强盛、人民安康的内容也与观众的心理期待相吻合。

表现共和国的辉煌历史,一些关键节点,如重大事件、精彩瞬间是不容错过的。然而如果一味地重复、再现观众已非常熟悉,多次见到过的场景只会让人感到单调,缺少热情。艺术永远是需要创新的,观众渴望新的观影体验。国庆档的几部影片在形式感上作出重大变革,给人耳目一新感觉的当属《我和我的祖国》。该片没有采用大事件、大人物支撑的宏大叙事方式,转而将视点放在几个普通的小人物身上,用小人物、小故事来反映大时代。影片所选取的7个年代史实,如开国大典、原子弹爆炸、香港回归、奥运会等,从表面上看都是大事件,但影片的主人公却都是普通人。7个小故事,把人们对共和国的集体记忆与每一个普通人的个人记忆巧妙对接。如此,影片给人亲切感,与观众建立紧密联系,使观众产生共鸣。比如《夺冠》篇章,叙事时间锁定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的重要时刻,讲述了小男骇冬冬与小美之间的儿时故事。上海小弄堂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场景烟火气十足,而冬冬手扶天线才能保住画面的情节,引起一代人的共鸣,联想到今天人们在超高清的电视机前观看阅兵的情景,祖国发展可见一斑。片中女排夺冠的画面又蕴含着另一层意义。恰巧中国女排在国庆前夕夺下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为影片增添了别样现实注脚。片中,成年后的冬冬与小美重逢又带出了中国乒乓球与海归知识分子的信息,可谓以小博大,事半功倍。

《北京你好》篇章讲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故事,但这一年还发生了汶川地震。影片将视角投向一名北京出租车司机身上,通过一张开幕式门票,一个小男骇儿,连接起奥运会与汶川地震两件大事,表现出千千万万不知名的普通劳动者与国家大事之间的关系,家国情怀由此得到具体体现。

随着时间的增长,一些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现实成了历史,一些重要的瞬间已经固化成文化符号,深深植根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在这些文化符号中,无数的个体记忆却是始

终散发着新鲜气息的。

类型化叙事,是影片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类型化叙事作为新主流电影的重要特点之一,把重大主题置于类型框架中,用恰当的方式来讲述故事。

《中国机长》是根据不久前发生的川航8633飞机遇险的真实事件创作的影片。真实事件本身几乎就是一部灾难片的样本。危机、救援(包括自救)、曲折、绝境、直到置之死地而后生、成功脱险……一部灾难片的基本元素已经都具备了。事件本身具有强烈的戏剧张力,甚至不需要再“创作”什么就是一部好看的影片。所以,《中国机长》在讲述故事时选择尽可能高度还原事件本身,极大地发挥了类型化的优势。同时,它与一些虚构的灾难片有所不同,该片没有刻意制造强情节,没有过度煽情,而是在戏剧性的事件表述时融入了纪实元素。比如,影片前半部分,用近乎白描的手法拍摄了一组飞行员与乘务员起飞前的准备,这组镜头带领观众走进神秘的飞机驾驶舱,让人们看到机长、飞行员、乘务员的日常工作,让我们对这一行业的从业者产生深深的敬意。令我最感动的是机长反复强调的观点:敬畏生命,敬畏职业,敬畏规章。这一组镜头与后面飞机出现故障时,机组沉着冷静的应对形成对照,将事件本身的戏剧张力与纪实性元素相结合,使影片有了独特的魅力,带给观众全新观影体验。甚至有人说,这部影片还带几分科普的意味,这恐怕是创作者始料未及的收获吧。

《决胜时刻》讲述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两大政治、武装集团的斗争。从样式上可以归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但是我们却嗅到了几分谍战、反特片的味道。影片中事件很分散,头绪繁多,但是观众却没有感到乏味、枯燥。因为为有悬念,观众始终关注特务的阴谋是否得逞。片中陈有富这一人物形象,是集中多个保卫干部的形象塑造的。反特、反间在当时是尤为繁重的任务。而这方面的内容也十分适合电影语言去表现。两者的结合让《决胜时刻》最终受益。

《攀登者》同样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影片,它记录的是中国登山队两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历史。该片既是体育片也是历史片,同时还有很浓厚的政治外交背景。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冲击珠峰时,中国与邻国正在谈判边界划分问题。对方说既然你们说珠峰是你们的,你们为什么没有人登过顶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组建登山队开始向珠峰进军。成功登顶后,邻国才承认了珠穆朗玛峰属于中国。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就是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从北坡登顶成功,却因为没能拍下有效资料而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这段历史过去国人很少知道。影片表现的这个内容有一定的揭秘性,也给故事增加了悬念。而摄影机也成为故事发展中贯穿始终的关键道具。



尽管有如此的背景,《攀登者》还是按照体育片的样式创作,讲述两代登山运动员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壮举。登山是勇敢者的运动。它是人类挑战大自然、挑战极限的运动。运动本身颇具魅力,也给电影提供了特别的表现空间和视角。影片近距离拍摄运动员攀登冰山的过程,让观众感受到这项运动的伟大,赞扬了运动员的勇敢精神。

上述献礼片得到观众的青睐,还因为其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新一代的英雄形象,令观众仰慕、喜爱。这些英雄人物的塑造,尽可能地除却了人为拔高的光环,让英雄回归平常、回归自然。张涵予塑造的机长、黄晓明塑造的救火队员,还有吴京、井柏然、胡歌等人塑造的登山队员都保留了人物的平民底色,又有英雄大无畏的气概,称得上有情有义、有勇有谋、有责任感、有担当。

最有特色的是《攀登者》中的曲松林,因为丢了摄影机,他终身自责,过度的执念,使得其性格扭曲。在李国梁牺牲后,他才理解了当年方五洲的选择。影片通过他留给观众一个思考,在生命和责任中该如何选择?



《我和我的祖国》中,葛优塑造的北京的哥张北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抓住了北京的哥的特点,表现出油嘴滑舌之下北京人的大度与善良。除了现实小人物外,近期一些献礼片在表现历史人物时也力求有所突破,比如《古田军号》中的毛泽东,一改沉稳、老成的样子,有了笑容,轻快地奔跑,有了青春气息。这部影片中还有一个人物刘安恭,按照以前的标准,应该是一个问题人物。但这部片子给了他充分的尊重。影片不掩盖党在成长路上曾经有过的失误,也不把失败归咎于某一个人,这是难得的进步。

谈到人物,就不得不提类型片中的重要元素——明星作用。中国的明星制体系虽然还不十分完善,但明星

经济已很现实。前几年不适当的明星定位,过度的明星消费,对行业造成很大伤害。但成熟的工业体系里,明星是类型片不可或缺的元素,用好明星也是影片成功的保证。近期在影视剧中比较活跃的演员差不多都加入到了献礼片的创作中,以实际行动为祖国庆生。这一批献礼片,能够快速吸引观众到影院,明星的贡献不能小觑,有的年轻影迷用公益场、集体观影的方式为自己喜爱的演员加油,为国产电影助力,掀起年轻人的爱国热潮。

电影是要造梦的,有了好故事,怎么讲还是一个问題。近20年,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有了长足进步,此前的《流浪地球》《战狼》《红海行动》等影片已为观众呈上视听奇观。在这批献礼片中,电影制作水平的提升有目共睹:《攀登者》展现了许多梦幻般的景观,珠穆朗玛女神的婀娜多姿、世界最高峰的险峻、大自然的强大威力,这一切与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壮举相融合,令人震撼;《中国机长》还原九千米高空风挡玻璃破裂后的情景,十分逼真,危机感动人心魄。

除了宏观上的场面营造,几部影片的细节处理也非常到位。《中国机长》塔台呼叫飞机的口气、语调、语速都与现实十分接近。《攀登者》的装备、工具、训练场景的表现也令观众大开眼界。

中国电影工业化体系的建设,专业性的发行、营销也助力献礼片票房一路走高。三部影片在国庆前夕同一天发片,看似有违规律,实际却是一个颇有战略眼光的发行方式。三部影片形成集群化出发,声势浩大,而又避免了单片之间的无序竞争。同时,档期的选择非常成功,借力国庆,助力国庆,迎合了观众强烈的爱国心理,影片所展现的内容与人们的愿望、感受相契合,最终打造出最强国庆档,得到票房与口碑的双赢。

《中国歌曲大会国庆盛典》央视播出

10月4日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中国歌曲大会国庆盛典》在综艺频道播出。整场晚会时长约120分钟,共分为“歌自民间”“歌中生活”“歌里有情”“歌有传承”“歌向世界”五大篇章。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晚会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歌手齐聚北京,用民歌唱响盛世华章,不仅有四川籍歌手李宇春、蒙古族歌手阿云嘎、陕北歌王王向荣等纷纷代表各自家乡献唱,更有来自黎平县侗族大歌艺术团、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措勤县民间艺术团等民间团体专程远道而来,将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文化样式搬上舞台。

晚会以“对话”与“交融”为设计理念,跨越国界、穿梭古今,以观众喜闻乐见的现代化表达方式助力民歌音乐、民歌文化、民歌精神的传播与弘扬。晚会上,来自比利时的音乐家尚·马龙与黎平县侗族大歌合唱团共同演绎作品《黎平》,尚·马龙指尖流淌的迷人钢琴旋律,为清亮般甘冽淳朴的侗族大歌插上远飞

世界的翅膀;霍尊与被誉为“海豚音王子”的俄罗斯歌手维塔斯通力合作,动情演唱音乐经典《茉莉花》,细腻温婉的抒情低吟与宏阔嘹亮的激昂高音完美融为一体。除民歌演唱外,晚会还特设有致敬非遗传承人、民歌抢救者、民歌艺术家环节:来自全国各地的12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一人唱一句民歌的方式祝福祖国、献礼祖国;在音乐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田青的带领下,17位来自最基层的民歌收集者和整理者也来到节目现场,他们手拿收集、记录、整理民歌的旧本、手稿,集体宣誓“中国民歌我为你骄傲,中国民歌我为你奉献,中国民歌代代相传走向世界”;在晚会最后一个特别环节,杜鸣心、李光羲等6位民歌表演艺术家登台接受观众的致意和敬礼。晚会在歌唱家李谷一和全体演职人员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歌声中圆满落幕。

(慧妍)

孤儿是人类一切关于不幸、痛苦、悲伤词汇的注脚,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儿冻死街头梦见奶奶最后的微笑,是《雾都孤儿》中奥利弗悲惨的童年记忆,是印证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人吃人社会最卑微的阶层。但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孤儿却因为强大祖国的呵护成为国家的孩子。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作品,于央视八套播出的电视剧《国家孩子》取材真实历史事件,讲述了1960年因自然灾害的缘故,有3000名南方孤儿被送到内蒙古草原,被牧民们领养长大的故事。在此之前,已有报告文学、舞台剧、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样式讲述过“草原额吉”的故事,在由中国视协主办的电视剧《国家孩子》创作研讨会上,专家们对该剧能够选择从孩子视角出发的新颖独特做法予以肯定,从现实主义手法、人性深度挖掘、文化思考等层面对该剧进行研讨剖析。

为苦难赋予温暖
决定现实题材高度

给苦难以温暖,该剧唱响了一曲辽阔草原的真情颂歌。有专家谈到,缺少家庭呵护的孤儿登上上海开往内蒙古的火车,他们的命运随着车轮的转动不知会走向哪里,故事本身非常煽情,但该剧镜头语言表述克制,导演巴特尔更不刻意表现苦难,而是选择平实、真诚地展现这一共和国历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事件。当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要求“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如果没有养父母,这些孤儿在人格塑造、意志品格等方面可能会是扭曲的,剧中这些国家孩子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成了医生,有的走上基层领导岗位,这些成就在出身决定命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很难产生的,这些成就所折射出的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成功。该剧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相互扶持的大爱精神,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两组文化概念
回答何为亲情与故乡

亲情与故乡,自古以来是文艺作品关注的对象。与会专家认为,该剧凭借这一特殊题材,重新阐释了“亲情”与“故乡”两组文化概念——真正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国家孩子」

□本报记者 许莹



的亲情是超越血缘与姻缘的大爱,真正的故乡是情感注入的地方。对于亲情的描摹,专家们认为,剧中的父亲是真正的父亲,母亲是真正

的母亲,孩子是真正确孝顺的孩子。例如该剧塑造的两位母亲,乌兰展现的是淳朴自然的母爱,缺陷是如此下去势必发展成为溺爱,满都拉则将母爱上升至责任层面,严厉正统甚至干涉孩子的婚姻自由,有些不近人情,两位母亲的设置饱含剧作良苦用心,二者特质结合在一起正是超越血缘与姻缘的人间大爱。对于故乡的呈现,与会专家认为,“吾心安处是故乡”,生养之地固然重要,但该剧更看重精神归属与情感寄托之地,把孩子们与草原难以割舍的情感放在首位。许多专家都谈到剧中多次出现的失明老人拉起马头琴的画面,草原文化的诗意表达不仅展现了蒙古人民的浪漫豁达,悠扬的琴声更为“国家孩子”融入草原生活提供了茁壮成长的精神飞地。该剧编剧柳桦告诉记者,他曾经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与国家孩子们同吃同住,为了准确捕捉内蒙草原的真实信息,他阅读了60余本与内蒙古相关的书籍并做了详细笔记,聆听了大量关于草场退化的讲座,以期抓住草原文化的发展脉络与精神内核。也有专家建议,剧中可以把国家孩子与马的感情写得

再深入一些,不仅仅把马当作运载工具,而是通过

直面复杂人性
性格塑造成全真实质感

《国家孩子》的成功,离不开该剧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尤其是对4位孩子个性的强调。与会专家谈到,该剧没有将孩子们的成长处理为受难、领养、成长、感恩的单一线索,4个孩子被抚养的过程不仅是受助的过程,也是他们同命运抗争的过程。朝鲁、通嘎拉嘎、谢若水和阿腾花4名来自上海的孤儿性格各异:朝鲁性格格外,不屈服于命运,回上海、职业选择等都是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品格的表现;通嘎拉嘎为人善良,也有软弱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位国家的好干部;谢若水奋发图强,终于考上了大学;被原生家庭遗弃的阿腾花心中有恨,养父苏书记在活动中被隔离审查,她后来还遭遇了婚姻的不幸,这种不幸亦有其偏激、自私的性格使然,最终历经生活坎坷的她实现了人性的复苏与回归。最后4名从内蒙古长大成人的孩子主动回上海寻亲的情节设计无疑是全剧华彩的一笔,孩子们没有把生活的苦难强加给对亲身父母的怨恨,也有专家建议,孩子们回归分别了50年的上海的重场戏,若能延续此前对人物心理拿捏的做法,借助音乐铺陈将情绪推向高潮更具感染力。

10月14日下午,扶贫攻坚题材电影《迟来的告白》在山西太原举行全球首场点映。电影《迟来的告白》由李彬导演,董波、罗米、张亮达等主演,影片讲述了退役军人余穆只身奔赴贫困山村,奋斗在脱贫攻坚一线,并最终带动全村脱贫致富的感人故事。影片不仅塑造了一个有理想有担当、小人物大情怀的扶贫典型,还把脱贫攻坚与企业转型有机结合,将当代青年三观转变融入剧情,如实地描绘出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真实状态。专家学者观影后认为,影片主题鲜明、立意新颖,摆脱了某些同类作品备受诟病的主题先行、故事模式化、人物简单化的刻板印象,以真诚的态度打造出了一部兼具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的作品。电影《迟来的告白》取材于山西、拍摄于山西,并入围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据悉,该片将于10月17日国家扶贫日在全国院线公映。(影文)

